

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历史沿革及文献述评

赵春雨

〔摘要〕混合所有制的出现源于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渐进推进的结果，并在探索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路径中得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实践早于理论，是实践中出现了混合所有制企业，而后得到理论界和政府的关注。从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探索与争论到政府对混合所有制的肯定和发展，再到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的研究，在实践探索与理论突破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独特范式。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15）—01—0048（06）

〔作者〕赵春雨，讲师，博士，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山西太原 030006

混合所有制的出现主要是源于国有企业改革与经济转轨，在探索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路径中得到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环节，从1984年至今，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S. Djankov（2002）专门研究经济转轨中的国企改革问题，指出了其对整个经济转轨成功推进的重要性。^{〔1〕}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东欧以及越南等国陆续步入转轨时期，国企改革都选择了明确的、有计划的私有化之路。但我国的国企改革却是个例外，私有化在1978年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属于禁区，由于无法摆脱当时的政治局限和意识形态约束，以及缺乏私有化需要的资金与市场化环境，我国的国企改革走了一条渐进与折中的道路。从最初放权让利的经营权改革，到最终股权多元化的所有权改革，如今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国有独资企业，一些成为包含非国有股份的国有控股公司；另一些则成为包含部分国有股但由非国有股东控股的国有参股公司。经过所有权改革形成的大量混合所有制企业如今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

大部分转轨国家的企业私有化之后都经历了严重的产出衰退过程，而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过渐进式改革不仅延续至今，而且绝对产出水平在不断上升，是所有转轨国家中经济增长

最快的国家。实践肯定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在新形势下探索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有效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既与以往论述一脉相承，又结合实际实现了新的突破，反映了经济市场化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为进一步推动混合所有制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国际上针对混合所有制的研究

尽管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其他国家早已存在，但并没有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点关注与深入探讨。首先，其他国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很少，在经济当中所占比重很低。其次，其他国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一般在特定领域和特定阶段存在，如在基础设施领域以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等形式存在，或者在私有化过渡时期存在，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通常会有比较明确的国有股减持和私有化方案。印度在20世纪60、70年代搞过混合所有制，但后来逐渐私有化了。国外少量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国企改革的发展演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研究方法大多是针对具体案例，采用实证分析法。如Stephen Brooks（1987）研究了英国石油公

司与加拿大发展投资公司等混合所有制公司案例,发现政府经常不顾公司商业利益,利用自己的股东权力迫使公司执行政府的公共政策。^[2]有学者发现,一些转型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政府有时愿意继续在一些企业中持有股份,在一定时期,混合所有制是一种良好的制度选择。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剩余的国有股对于从公司治理角度而言是个难题。总之,混合所有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际学术界关于混合所有制研究的文献虽然较少,但是这些文献对于我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的探索与争论

中国混合所有制萌芽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转轨,与我国国企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相伴相随。从早期文献中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的实践早于理论,是实践中出现了混合所有制企业,而后理论界和政府开始关注这类企业。改革初期,基于对改革风险的担忧,中国采取了一种巧妙的减少改革不确定性风险的方法,那就是允许少数敢冒风险的人或者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严重包袱的国有企业进行局部试验性改革,以观察试验效果以及官僚体系与普通民众的反应。由局部试验形成良好示范效果进而全面推进改革的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更具稳妥性的国企改革路径选择。这一时期,国企改革探索还仅局限于控制权改革,核心是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落实,尚未触及所有权改革。1978年底,四川化工厂等6家国有企业自己请求并征得四川省政府同意,实行放权让利试点,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企业产出与职工收入双增长的效果,进而得到上级的肯定。1979年,董辅初提出,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就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连最起码的生产经营决策权都没有,既无法进行独立的经营核算,盈利、亏损也和职工无直接关系。国企改革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摆脱行政机构的干预。^[3]同年7月,国务院在总结四川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颁布并实施《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1984年,又进一步深化了放权让利政策,规定国有企业享有生产经营决策、产品销售、物资采购、留用资金使用、资产处置、机构设置、人事管理、产品定价、工资奖金分配、联合经营等10项自主权。但是,放权让利改革在实践中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并滋生了政企不分、扯皮摩擦、利润分配矛盾、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短期行为等一系列新问题。尤其是承包

制与租赁制的实行开始触及到了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国家强化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与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在现实中似乎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控制权改革局限性的凸显,学术界对于国企改革的探讨逐渐涉及到了企业的所有权改革。我国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普遍接受了西方学者关于产权制度是企业最基本制度的观点,认为国企改革根本无法回避产权制度改革,即“所有制改革”。国家也开始意识到所有制改革无法避开,但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董辅初(1987)指出,国有企业还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真正实现自主经营,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家所有制,并提出了国企改革可以试行股份制的思路。^[4]基层企业当时也出现了一些自发的民营化指向的所有权改革。但是,当时学术界讨论所有权改革,私有化是禁区,尝试着以股份制的形式在国有企业中引进一部分非国有股进行所有权改革的理论探索就成为典型。1986年,国家体改委的童大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化的文章,肯定了改革以来一些城市的股份制试点是有成效的,值得重视。提出包括国有企业和联合企业应该实行股份化,大体可以采取4种形式:向本单位职工发行股票;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企业之间相互参股;与境外资本合资。^[5]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制形式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可以继续试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但是对股份制的尝试,本质上就触及到了所有权的改革,而我国股份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不同性质的资本融合所形成的股份制。

鉴于实际中已经出现了股份制形态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学界开始呼吁顺应市场潮流积极发展股份制,同时提出以股份制的形式打破所有制界限、让不同所有制股份融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开始出现。1987年,薛暮桥先生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演变》一文中最早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这一概念并加以论述,指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制形式日益复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或私人企业之间的合资经营日益增多,由于投资方属于不同的所有制,采取的是股份制形式,就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另外,有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向内部职工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这样的企业也是兼有公有制与合作制的混合所有制。^[6]不过,此时他仍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1988年,四川省体制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对实际出现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调研基础上,提出除国家控制的少数战略性企业外,应当允许和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以参股的形式进行产权渗透、兼并、融合,并要承认其合法性。^[7]初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无法避开意识形态,一项改革如果在社会主义范畴内的,就可以快速的推行;如果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就会显示出小心谨慎甚至回避的态度。每一项改革的推进首先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得到政府的肯定,才能得以大刀阔斧的推进。这一时期,学界开始倡导通过引入国有企业职工股来增加混合所有制的政治合法性。1992年,蒋一苇提出应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经济,公有股包括国有股、公有资本为主的法人股、职工集体股、职工合作股等,其中的职工集体股、职工合作股都属于公有股而不是个人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股份。^[8]这一理论对后来的政策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实行了内部股份制改革。因此,最初的所有权改革主要是面向内部人的私有化,股权出售给职工的是股份合作制,出售给管理层的被称为管理层收购。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肯定了股份制,对股份制改革的争论才逐渐趋于统一,理论开始大胆突破。一些学者尝试着提出将国有产权向私人或境外非国有投资者出售的思路。同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股份制为特征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出随着产权重组和流动,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数量呈增加趋势,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这为国企改革进一步推进解放了思想。1993年,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片课题组指出,非国有制经济在改革中表现出很强的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权相互渗透,界限越来越模糊,很难再按所有制形式来划分,更多的混合型的产权结构将出现,并明确提出了要调整和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9]这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的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文献之一。同一时期,厉以宁(1994)也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具体思路,并积极倡导国企推进股份制改革。^[10]

三、混合所有制的肯定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纷纷陷入财务困境,造成连年亏损甚至资不抵债。1997年,吴敬琏、刘世锦、张军扩等(1998)在为党的十五大提供的政策咨询建议报告中提出:一要通过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收缩国有经济战线;

二要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通过大量引入非国有股东将国有独资企业改造为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富有活力的微观主体,这些思想逐渐引起政府高层重视。^[11]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阐述了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的关系。同时,国家决定用3年左右的时间改革攻坚以实现国企的扭亏脱困,大面积的所有权改革开始展开,尤其是中小国企的所有权改革更加彻底。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03年左右并达到高潮,大多数的小型国企被出售,中大型国企通过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据徐善长(2006)的统计分析,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江苏89%以上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了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企业;1997年,江苏省混合所有制企业产出占全省产出的40%以上;2003年底,浙江省登记在册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占全省企业总数的61%。^[12]学界针对混合所有制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增多,由实践经验总结逐渐转向宏观理论探索。对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混合所有制企业概念的界定逐渐清晰:即宏观上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制结构中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成份,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合资合作等各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状态就称为混合所有制经济。^[13]微观上指同一经济组织中国有、集体、外资、个人等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产权配置结构,也称混合所有制企业,常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与合作、联营等方式存在。^[14]

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重要的企业要国家控股。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指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之后的研究开始摆脱为意识形态辩护的局限,论证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越性,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何力胜(1999)指出,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要高于纯粹的国有企业。^[15]许小年(1999)以上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具有更好的绩效优势。^[16]进入21世纪,混合所有制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一些学者开始探讨政府应该

以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文献主要集中于体制障碍的突破、产权制度的完善、法律保障、国资监管等方面,研究方法上还出现了少量的实证性研究。朱光华(1999)认为,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重组和融合是混合所有制发展的重要内容,新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构建应该体现和遵循市场规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17]吉林省工商联混合所有制经济课题组(2004)认为,产权流转方面存在的问题成为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制约,并就完善产权市场体系、促进产权流转顺畅提出了建议。^[18]李正图(2005)研究了公司制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问题,提出各相关利益者之间不同的交易关系应当与不同的规制结构相匹配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建议。^[19]朱效平(2007)从发展混合所有制中刑法保护的角度出发,发现现行刑法有关国有经济的“特殊保护”规定明显滞后。需要遵循刑法平等原则,完善刑事立法,一体规制与平等保护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加大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范围和力度是保护国有经济的现实需要。^[20]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推动政府决策、形成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文献基本上还是集中于宏观领域针对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还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微观领域具体研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分类与公司治理问题。

四、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研究

从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混合所有制企业大量涌现,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理论研究开始逐渐深入到了具体的、微观的领域。鉴于搞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其经营效率,对于推动国企改革、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如何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从而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就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但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与其他企业具有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存在国有股份与非国有股份的独特性,在这样独特的股权结构下,各股东对于公司经营的目标可能会不同,这就造成了企业治理的困惑。由于国际上相似案例较少,没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如何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分类界定、功能定位的前提下进行公司治理研究就成为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1.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分类界定与功能定位

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其股权特征通常可以分为:国有控股(国有绝对控股、国有相对控股)与国有参股两种类型。国有控股公司的界定既有学界的定义,也有法律的规定。郑海航(2005)认为,当控股公司出资者是政府,即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分股份属于国家所有时就成为国有控股公司。从国内外国有控股公司来看,大多具有以下特征:政府以国家名义出资;除从事资本经营、管理活动外,也有具体从事生产经营的;有些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既可以是国家独资的也可以是国家控股的。^[21]我国国有资产管理局1995年8月21日印发的《关于组建国有控股公司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国有控股公司是国家授权对一部分国有资产具体行使资产收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出资者权利的特殊企业法人,只行使出资者的职能,而不行使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因此,国有控股公司就是指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政府以独资或多元化投资形式建立的旨在控制其他公司,从事产权、股权经营、生产经营以管理各个被控股公司而存在的国有公司。国有参股公司严格来说应该称之为“国家参股公司”或“政府参股公司”,不是国有企业,政府只是普通参股者,受公司法规范。这类企业类似于一般竞争性企业,没有强制性社会公共目标,经济目标居主导。对于这类企业,政府参股只是为了壮大国有经济的实力,除此之外,政府对这类企业没有任何其他附加义务。

2. 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

1993年《公司法》的出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奠定了法律基础,形成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相互制约监督的现代企业治理格局。随着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内外学者针对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陈晓等(2005)发现,我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普遍缺乏透明度,政商关系不清晰,法治程度也较低,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侵占其他股东利益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大股东常常利用关联交易的方式来达到利益侵占。^[22]此外,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当中一个严峻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按照市场规则融入市场经济运行之中。鉴于国有控股公司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大量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有控股公司。虽然当前针对国有参股公司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一些企业的国有股权比重随时可能被政府根据公司经营业绩进行调整,尤其是那些上市后业绩较差的公司的国有股权可能会被减持,这样,部

分国有控股公司可能会变成国有参股公司。^[23]

3. 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部治理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公司治理主要由委托代理问题所引起,而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公司治理通常强调股东和董事会及管理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李正图(2005)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与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同,传统的公司治理强调股东至上,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理、科技人员、技工等应该参加股东会和董事会并参与决策。^[24]白重恩等(2005)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公司的股权结构设计很重要,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其他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从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25]另外,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也从不同视角针对公司治理问题提出了系统性解决建议。张文魁(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的转移对于业绩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司治理的转型比所有制转型更加重要。他从股权结构的设计、股东间及股东与政府间的约定条款、核心高管职位的分配、政府的特别规制、职工的雇佣关系等5个方面提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框架。^[26]石予友(2010)从“利益冲突的视角出发”,提出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的主体包括企业股东、经营者、员工三方面。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以承担企业剩余风险、享受企业剩余收益的公司治理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治理目标,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协调企业股东、经营者以及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三者利益的最大化。^[27]郑海航(2010)从公司内部治理与国资监管视角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为防止内部人控制,在董事会治理中实行内部董事、外部董事与独立董事三分制衡制度;由国资委选派人员的外派监事制度;总经理的选择逐步向市场聘任制过渡,逐渐完善现代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28]

总之,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是个世界性未解难题,美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力求减少甚至取消这类公司来规避这一难题。而我国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总目标,就不能取消这类企业,相反,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产业领域还必须加强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五、总结

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是所有权改革渐进推进的结果,是中国文化中变通、中庸思想的体现,这种渐进的所有权改革对

于推动国有企业平稳融入市场经济体系是有好处的,但是,渐进式改革也导致了巨大的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因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独特范式。具有如下特征:(1)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从最基层最小的国企试点开始,依次向更高层更大规模的国企推进。(2)民营化从面向内部人逐渐面向外部投资者。(3)所有权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股权多元化降低国有股权比例,形成混合所有制格局,然后通过不断的股权流转,一些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完全实行了非国有化;一些战略地位重要的企业仍然保持了国有控股,但是,他们通过分拆改制、合资和上市的方式可以实行部分的私有化。(4)大部分改制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形态能够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股权结构具有动态性。

近年来,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借助非国有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国企改革成为国家的一项战略选择,但是,为了降低意识形态风险、减少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影响国计民生的较大企业维持混合所有制形态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策略,这种混合所有制格局将会长时间保持。当然,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股权结构,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国有股比例逐步下降、非国有股比例逐步上升可能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参考文献:

- [1] S. Djankov, R. L. Porta & F. Lopesde Silanes et al.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 (01): 10.
- [2] Stephen, Brooks. Mixed Ownership Corpora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Public Policy [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87, 19 (02): 8.
- [3] 董辅初.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 [J]. 经济研究, 1979, (01): 21-28.
- [4] 董辅初. 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 [J].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7, (01): 12-21.
- [5] 童大林. 股份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新基点 [N]. 人民日报, 1986-08-18.
- [6] 薛暮桥.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演变 [J]. 经济研

究, 1987, (02): 15-28.

[7] 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J]. 经济研究, 1988, (12): 29-35.

[8] 蒋一苇. 关于股份制的若干认识问题 [N]. 人民日报, 1992-05-25.

[9]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片课题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思考与政策选择 [J]. 经济研究, 1993, (08): 3-24.

[10] 厉以宁.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20-28.

[11] 吴敬琏, 刘世锦, 张军扩.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8. 10-12.

[12] 徐善长. 关于江苏、浙江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 [J]. 经济研究参考, 2006, (84): 2-7.

[13] 潘 石. 中国“混合经济”论 [J]. 当代经济研究, 1999, (09): 18-23.

[14] 王华荣. 论混合所有制经济 [J]. 经济问题, 1998, (09): 14-16.

[15] 何力胜等. 混合所有制——一种最具市场兼容力的所有制形式 [J]. 经济问题探索, 1999, (07): 8-10.

[16] 许小年. 以法人机构为主体建立公司治理机制和资本市场 [J]. 改革, 1997, (05): 27-33.

[17] 朱光华. 过渡经济中的混合所有制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23-24.

[18] 吉林省工商联混合所有制经济课题组. 促进产权顺畅流转,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J]. 经济纵横, 2004, (04): 25-29.

[19] [24] 李正图. 混合所有制公司制企业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5, (05): 19-27.

[20] 朱效平. 平等原则下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 [J]. 政法论丛, 2007, (06): 67-70.

[21] 郑海航. 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制度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05): 5-10.

[22] 陈 晓, 王 琨. 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 [J]. 经济研究, 2005, (04): 77-86.

[23] 李 涛. 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国有股权. 经济研究, 2002, (08): 19-27.

[25] 白重恩等.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5, (02): 81-91.

[26] 张文魁. 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20-28.

[27] 石予友. 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9-17.

[28] 郑海航.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国有控股公司研究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0. 148-176.

Development of the Mixed Ownership and Literature Review

ZHAO Chun-yu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mixed ownership was the result of gradual ownership reforms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was developed in the exploration of formation and methods of combin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market economy. The practice of mixed ownership was previous to its theories. That is to say, it was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enterprises with mixed ownership that it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oretical circles and the government. After much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it obtained the government's affirmation. Then there was specific research on how to govern enterprises with mixed ownership. In the end, a unique model for reforming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gradually formed as the result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Key Words: mixed ownership; state-controlled; state-participa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杨静仪